

抗战时期毛泽东如何推动调查研究

□ 王 飞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虽然很少有机会集中一段时间专门到一个地方搞系统的社会调查，但是通过深入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集中精力进行理论上的建树，并逐步把调查研究活动推到全党，使广大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切实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指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一）

尽管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全面清理。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没有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所讲，虽然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

毛泽东从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对党已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这个时期毛泽东主要是对调查研究理论进行升华总结，使之系统化，并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更好地清算“左”倾错误的思想影响，更好地领导全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看到，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开辟，一些游击队领导缺乏实地调查，瞎指挥，喜欢一到任就宣布错误，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不仅会做错事情，失去群众信任，而且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在遇到困难无法解决时，不去调查研究却请求工作调动。这足以说明，在广大根据地，主观主义仍然普遍存在。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截止到1941年，党员已经发展到80万，其中大多数的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大革命时期的战争洗礼，没有经历土地革命时期严峻的革命锻炼，对于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没有切身认识。

基于此，毛泽东深感有必要进行一次广泛的、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期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党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泽东以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远见，告诫全党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二）

为配合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局长，并兼政治研究室主任。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遴选研究工作人员40余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也为调查研究成功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决定不仅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意义，还对建党以来在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作了如实的评价和总结，并详细规定了调查研究的实施办法。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各抗日根据地、延安的中央机构及各部委、边区政府和其他群众团体，纷纷组成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这些调查团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形成系列调查报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成为党制定相关方针政策的可靠依据。如李卓然率领调查团赴延安固临县开展农村调查，为党中央经济发展方针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央妇委开展的妇女生产生活调查，为党中央制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奠定了基础。贾拓夫主持的对回族和蒙古族的调查研究，为党的民族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毛泽东综合各调查团的调查材料，对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全面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关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粮食等存在的问题。对每个问题均作详细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如关于发展农业方面，不仅调查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农业发展的概况、农业发展的历程，而且从总结出农业发展的几个主要教训，科学地提出了农业的政策。毛泽东经过这样一系列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找到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规律，制定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及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基础。

（三）

毛泽东除了运筹帷幄领导抗日战争、开展理论创作、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外，还利用多种形式和一切可用机会亲自开展社会调查。

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一次典型的会议调查。由于当时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来到延安，带来了诸如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等诸多问题。为此，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前，毛泽东通过写信、座谈、个别约见等方式，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特别提醒文艺界人士：“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最终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硕果，从理论上解决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把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小砭沟的婆姨为什么不生娃”则是通过谈话调查而找出解决之道的。一天，毛泽东去枣园途中路过小砭沟，见两个上了年纪的人蹲在一起，唉声叹气地拉着闲话。他走上前去打招呼，才明白他们在为小砭沟的婆姨不生娃而发愁。回到枣园，他马上打电话给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要他火速赶来。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他：“小砭沟的婆姨不生娃娃，这个情况你知不知道？”张汉武回答：“我听说过这个情况。”毛泽东问他有没有调查过原因，会不会是吃的水有问题，提出请中央医院去把水化验一下。张汉武担心这种小事医院不干。毛泽东严肃地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决不是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几天后，化验结果显示，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长期饮用这种水，妇女就不易怀孕，即使怀了胎，胎儿的发育也会受影响，不是早产就是畸形。原因找到了，中央医院指导群众对水进行了处理，并对群众的疾病进行了治疗。一年以后，小砭沟就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抗日战争时期，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毛泽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实践和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极大地推动了全党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为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烈火中永生

——邱少云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马奇柯

地上，一直到牺牲也没动一下。

同年十一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追记特等功，并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授予“一级英雄”称号。中国共产党志愿军某部委员会追认为党员。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一九五九年
四川省铜梁县人民政府组织修建敬立

碑文简要介绍了邱少云生平，记述了他的牺牲过程及获得的荣誉，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位伟大的志愿军战士，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用自己年仅26岁的生命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人的坚强意志，什么是中国军人的血性！

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

邱少云1926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关渡乡（今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9岁时父亲被雇主害死，11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3岁外出帮工，放过牛、做过小工、当过跑堂，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1948年夏，邱少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旧军队他受尽折磨。1949年12月在成都战役中，邱少云获得解放，之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被编入解放军第10军29师87团3营9连1排3班，在人民军队里他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明白了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受苦的人就不能得解放的道理。

1951年4月下旬，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罗加山战斗中，邱少云所在的9连，奉命主攻含水洞162高地，驻守高地的是装备精良的菲律宾营。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坚固工事和凶猛火力，封锁冲锋道路阻止我军进攻。全连冒着密集的弹雨，连续冲锋三次，均未成功，伤亡巨大，形势十分紧急。邱少云作为连队骨干，担负着为前线运送弹药的任务。为了第一时间抵达前线，他



以身作则，体恤战友，每天晚上别人一夜运三趟，他运四趟，别人背上放一箱弹药，他总是放两箱。在邱少云的带领下，弹药总是安全准时送达阵地，有力保障了前线供给。在9连指战员的奋勇拼搏下，终于拿下了162高地，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邱少云在这次运输任务中严格要求自己，发扬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火中锻炼出严明的纪律性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迅速成为战斗骨干。

最坚忍的潜伏

1952年10月，为配合朝鲜停战谈判，美军和志愿军在上甘岭展开了激烈争夺。邱少云所在营担负攻击敌前哨阵地391高地的任务。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发起突然攻击，在发起总攻的前一天，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邱少云作为第一突击队爆破组组长率先潜伏在距离391高地几十米的荒草丛中。

第二天临近中午，几个敌人突然从山上走下来巡逻，为不暴露埋伏的部队，我方炮兵果断向敌人开了一炮，慌乱的敌军盲目向四周发射燃烧弹，溅起的火星点燃了邱少云的棉裤，火势越来越旺，邱少云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吴萱提

会上认为：留学生要团结起来，组织力量向中国驻日公使馆作斗争，因为问题是由大小军阀间为争夺地盘混战、不顾学生死活而造成。同时，还要争得留日学生总会的声援。作为学生总代表，周逸群在集会后同其他学生代表前往公使馆，经过一系列艰苦斗争和严正交涉，终于解决了问题。国家的积贫积弱与内外纷争，促进周逸群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不断学习与比较中，周逸群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日文译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经典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订阅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进步报刊，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

创办办报引领青年。1923年10月，周逸群回到祖国，看到列强横行、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惨烈景象时，他感到十分痛心，决心发挥自己特长，用手中的笔和纸宣传马列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于是《贵州青年》诞生了。由周逸群、李侠公执笔撰写《贵州青年社发刊词·宣言》的发刊词，较为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我们对于政治，主张：一、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二、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三、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于解决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给予《贵州青年》支持与关怀，得到萧楚女和恽代英等一致肯定与好评。如萧楚女专门撰

文高度评价了《贵州青年》和周逸群刊发其中的文章。在办刊期间，周逸群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写了《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主张》《贵州问题的先决条件问题》《三民主义与贵州》等政论性文章，启发了进步青年的思想，在贵州及西南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对西南政局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4年，周逸群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和青年运动。同年8月，周逸群南下投考黄埔军校。10月，他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宣传干事。在学习军事的同时，他与周恩来等人密切合作，继续进行党的宣传和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同年底，周逸群与蒋先云、李劳工等共产党员成立了“火星社”，把青年军人中的进步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1925年2月1日，黄埔军校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逸群任主席，搭建了团结革命军人的阵地和桥梁。毕业后，周逸群按照党的指示，继续留军校领导这个组织。他创办《青年军人》《中国军人》等刊物，制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写下许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论性文章。如《说牺牲》《外祸与内扰》《总理逝世后之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等。这些文章赞扬了为革命牺牲的无数先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受到广大进步青年军人的欢迎，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参与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遵照中共两广区委指示，周逸群成立北伐左翼宣传队并担任队长。同

逐渐被大火包围。

此时，邱少云的班长马遂群，就在邱少云右后方约20米的地方，目睹了邱少云牺牲的全过程。只见邱少云紧咬牙关，两只手使劲地向地里挖，到后来被浓烟熏得几乎睁不开眼，呛人的气味使人昏厥。

这一刻，只要邱少云翻一个身，拍打几下就可以把火苗压灭；或者起来后退几步，到那条水沟里打个滚，也可以迅速自救。但是，邱少云没有那么做。为防止携带的爆破筒和子弹遇热爆炸，他强忍着烈火烧身的剧痛，轻轻将爆破筒推向一边，将子弹埋到土里。就这样，烈火在他身上燃烧了半个多小时，直到牺牲，他始终分毫未动。

总攻的时间终于到了。战友们怀着满腔仇恨，高呼为邱少云报仇的口号冲向敌人的阵地，将红旗插上391高地。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在391高地雄伟山峰的石壁上，刻了一行鲜红的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邱少云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他的英雄事迹永远地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绝对忠诚、严守纪律、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英雄品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年9月，周逸群奉命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贺龙所部任党代表和师政治部主任。从此，周逸群与贺龙通力合作、并肩战斗，加强部队中党组织的活动和教育宣传工作，着手对这支部队的改造。他们建立了部队政工机构，配备了各级政工人员，在部队中选拔培训大量干部。经过较短时间，周逸群与贺龙就把这支队伍建成了一支忠诚于党、忠诚为民族的部队，后来发展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

1927年，这支部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是起义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之一。南昌起义之后，这支部队又在朱德领导下，参加了会昌战役，歼灭了敌军钱大钧部，后来又攻克潮州、汕头等地。部队在潮汕失败后，周逸群赴湘鄂边，与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人民群众拥护下，周逸群指挥部队运用游击战术，粉碎了白军的多次进攻，创建和领导了洪湖赤卫队，建立了著名的洪湖苏区。周逸群在长期繁重工作中，身体严重透支、几欲病倒。身边人员连忙劝他休息，周逸群却说：“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一天不停止党的工作。”1931年5月20日，时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的周逸群，不幸被国民党军杀害。

